

一场意义重大的有关经济改革方向问题的论战

尹伯成

程恩富教授就10方面问题同张五常教授展开的论战，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语言泼辣、文笔锋利。我无法对这场论战妄加评论，因为我本人并没有读过《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中国的经济革命》这4本张五常先生的著作。但读了程恩富教授这10篇问张五常先生的文章以后，感到这场争论的意义确实非同寻常，值得理论界都来重视。

首先，这场争论涉及我国应当走什么道路的政治大方向问题。张五常教授以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为依据，断定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必须走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道路，或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向认为若要发展经济，私产制是我所知的唯一可靠的途径”，“私产制度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一句话，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独步单方和唯一选择”。程恩富教授用事实和逻辑对此坚决驳斥，坚持以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为“猫论”的实质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下，利用多种产权制度和政策手段，来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加强公有制经济，以便在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并强调“公司制不等于私产化”，“我们要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应是以公有资产为主体的公司制度和合作制”。显然，两位教授的立场和观点完全相反，针锋相对。按张五常教授主张，中国必须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道路，按程恩富教授的主张，中国应当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一场要把中国引向何处去的大是大非的政治方向之争吗？

第二，这场争论关系到中国改革究竟要以什么样理论为依据。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是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是指：其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其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其三，由国家实现将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相结合的宏观调控。可是，张五常先生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用他的话说是：“一方面坚持共有的优越，另一方面是支持自由市场，这其中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吗？”在他看来，“私有产权是真正的市场的先决条件”，即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这样，中国如果要通过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就只能走私有的市场经济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种观点，程恩富教授展开多角度分析批评，说明在一个国家调节的作用发挥得较好的社会里，各种公有产权也可以与经济相融合，产生较高的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此相适应，程恩富教授还彻底批评了张五常先生关于自私人假设是唯一合理的经济分析的观点。拔除自私人假设，实际上是对必须走私有化道路的主张的釜底抽薪。依张五常先生所见，“人性生而自私，不可更易”，故“以利他主义为本的改革必定带来浩劫”，而共产主义正是“错估了人类的本性”，“以为可以通过教育将人类行为改变过来”，于是，“搞什么‘精神文明’……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又怎么不教人悲从中来？”一句话，他认为人天生是自私自利的，因而只能搞私产制，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失败。这种观点与逻辑，在西方的许多思想家和理论家那里

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对此作过不少分析批判,但现在程恩富教授的分析批判则有他特别深刻和独到之处。他从人的本性是否天生完全自私,自私人假设能否成为唯一合理的经济分析,以及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要不要配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三个方面,确实把这个难题给说透了。只要不是存心为私有观念和私有制度辩护的人都会认为,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的分析评论是可以信服的。

第三,这场争论还涉及中国改革和发展所应采取的一些重大步骤和做法。张五常先生不仅给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指出要走私有化道路,并从人的自私自利本性中寻找了走这一道路的根据,而且还给中国怎样在经济改革中走上这条路出了不少“主意”。例如,在讨论如何解决干部贪污腐化问题时提出,可“将某些资产干脆地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人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作为放弃特权的交换”。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理由是:管制必然带来贪污,贪污属于高干的特权,要特权分子不贪污,只有干脆赠送国家资产给高干私有,让他们“弃官从商”。如果真按这套“主意”去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推翻旧政权的革命,将不折不扣地蜕变成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一个剥削集团推翻另一个剥削集团统治的改朝换代。但中国共产党毕竟不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集团,绝不允许自己的党员和干部搞特权和贪污腐化。如果把国家资产送给要搞特权的高干作为私产,共产党不允许,全国人民也绝对不答应。用这种办法实现“私有化”改革,正如程恩富教授所说,“稍有世界历史经验和中国国情常识的人,大概都会明白:这是一个比美国萨克斯建议俄国搞‘休克疗法’更易带来混乱无序的‘下策’”。

程恩富教授和张五常先生的论战涉及的重大问题远不止这几个,但仅就上述这些也可看出:他们争论的实质和价值,说到底是一场关系中国要走哪条路的大争论,绝不是什么单纯打笔墨官司。当然,争论双方究竟谁是谁非,谁代表真理,谁属于谬误,最终要由历史来作结论。我相信,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系博士生导师;单位邮编:200433)

关于市场经济的体制规定和制度规定

顾海良

程恩富教授“十问”张五常先生,对其“理论”与“见解”作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论析,在北京引起了许多经济学研究者的重视,得到了高度的评价。近年来,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之所以在我国经济学界流传开来,与这一时期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讨有关。在我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借鉴和利用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市场经济理论的有价值的东西,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借鉴和利用决不是生吞活剥的、照搬照抄的。当前,在我国经济学界,仍然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为指导,在广泛吸收当代经济学发展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的基础上,创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新理论。

要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首要的是对市场经济范畴本身能作出科学